

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 挑战、原则、架构和路径

丁元竹*

摘要：本文直面志愿服务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理论研究滞后和研究范式乏力、法治建设有待加强、工具理性冲击价值理性三重挑战，提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的建构路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从“党建+志愿”等实地案例中提炼经验要素，推动志愿服务从实践创新升华为文明自觉、理论自信、技术实用的“道术统一”体系。当前，技术革命，社交媒体普及和数字化浪潮已成为影响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基本因素。志愿服务理论研究必须回应这些因素，并为解决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作出贡献。本文的创新性主要在于首次系统阐释了志愿服务“道术统一”的理论范式；将“义利观”转化为当代价值；探索志愿服务在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角色模型。

关键词：志愿服务；道术统一；理论体系

一、引言

当前，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构“道术统一”的中国志愿服务理论体系，使其成为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和持久动力。本文所谓“道术统一”，是指志愿服务的价值理性（道）与实践活动（术）有机融合，既强调志愿精神引领，又注重在实践效能基础上的理论建构。首先，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广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更好发挥志愿服务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习近平，2022: 350-351）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志愿服务与社会文明的内在逻辑——通过激发个体的利他行为，志愿服务能够唤醒社会成员的责任意识与奉献精神，推动社会文明程度整体性提升。历史和现实表明，唯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传统与现代贯通，才能使志愿服务理论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亮丽名片。其次，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它将促使志愿服务在价值导向、实践路径和目标追求上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该体系通过价值引领，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创新与文明互鉴，推动探索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进程中志愿服务的实现路径，以及在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体制机制。再次，面对现实

* 丁元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出现的有违志愿精神的现象，必须加强志愿服务理论创新。近年来，将志愿服务时长纳入教育评价体系和社会激励机制，显著提升了社会参与积极性，有力推动了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然而，志愿服务时长交易等现象在一些领域显现，引发社会关注，成为热点问题。志愿服务时长购买不仅挑战了志愿精神，也折射出志愿服务过程中存在的制度漏洞。要让志愿服务回归初心，真正发挥其价值引领作用，不仅要完善相关制度，也必须加强理论建设。

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既是志愿服务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破解志愿服务发展深层矛盾的必然要求。其一，有助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自主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术界在知识体系建构上一定程度受西方范式影响，致使包括社会组织理论、志愿服务理论在内的某些理论缺乏自身话语权。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需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思想精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价值观念体系。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重要论述与重要指示批示为指导，确保志愿服务理论发展的正确方向，将“以人民为中心”“共建共治共享”“现代社会文明”等理念融入志愿服务理论体系，保障志愿服务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其二，有助于增强国际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在实施“一带一路”国际志愿服务等项目中，中国志愿者把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等经验转化为知识和文化产品，为沿路各国提供普惠性公共产品，提升了制度性话语权。志愿服务把“雷锋精神”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传递中国文化软实力。其三，承载着学科创新与人才自主培养的学术使命。建构涵盖理论、政策、实践全链条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将推动新兴学科建设，完善培训体系，培养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解决新时代志愿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短板等问题，进而推动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

本文提出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是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赋予新时代志愿服务深厚文化底蕴与历史使命，注重方法论创新，使志愿服务知识从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实践，最终实现“理论—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跃升，为志愿服务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习近平，2023）

二、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现实挑战与理论需求

（一）直面志愿服务蓬勃发展的深层结构性挑战

当代中国志愿服务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亦面临深层次结构性挑战。一是一些在境外制度环境中生成的理论范式难以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特征”这一核心问题，也难以解释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志愿服务模式。因此，必须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

论体系以提升中国志愿精神成为国家的软实力。二是志愿服务法律关系模糊、服务标准缺位、侵权责任认定不清等问题，凸显了志愿服务法治化建设的紧迫性，也反映了理论建设的必要性。三是市场化浪潮冲击传统互助伦理，部分领域出现志愿精神工具化、商业化倾向，削弱了志愿服务的内生动力。面对这些挑战，必须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解决方案，而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本质上是文明自觉与理论创新的辩证统一。

（二）志愿服务理论体系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人们生活的世界具有高度复杂性，一切事物相互联系。随着志愿服务事业影响力日益增强及全民参与度不断提高，应对志愿行为进行更深层的解读。当前，中国志愿服务学术研究面临以下问题：一是“道”的缺位。学术界对志愿服务核心价值、志愿精神与志愿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研究尚不充分，这是造成志愿服务碎片化、工具化的原因之一。部分志愿服务活动沦为短期功利行为，一些志愿服务培训缺乏系统性、理论性、学理性与针对性。当前，需以志愿服务的“道”与“人民性”为根基，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清晰回答“为何志愿”这一终极命题。二是“术”的失序。志愿服务活动与培训中常出现简单的“技术堆砌”，追求名词创新，缺乏时效价值评估和理论可阐释性，造成“有方法无方向”的悖论。必须把志愿精神转化为可内化于心的方法论，使志愿服务项目服从于价值理性。三是地方性知识缄默。基层创新的“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时长”等实践，因缺乏学术话语转译而多停留在经验层面，难以升华为可复制模式，需要建立“实践—理论—政策”的协同演进机制，通过实践智慧推动志愿服务学科建构与智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时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习近平，2023: 486）志愿服务学术领域同样存在此类问题。志愿组织与基层机构往往过于关注服务本身及操作方法，很少花时间解释其行动的原因，理解服务项目背后的底层逻辑及其与顶层设计之间的关系。在讨论志愿服务合理性、合法性时，理解其动因至关重要。志愿组织的选择必然由特定愿景驱动，愿景反映了组织者希望世界呈现的面貌，这是理想主义与长期主义驱动的志愿服务，也是志愿服务活动的灵感源泉。志愿服务理论研究亟须突破“低水平实践循环”——既要为志愿行动提供意义坐标，也要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逻辑支持，最终使志愿服务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与社会文明的标志。四是当前志愿服务存在资源分散、各自为政、专业化不足等问题。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可以从“党建+志愿”模式（如党员带头、社区结对帮扶）中提炼理论，设计符合国情的志愿服务动员模式与激励保障机制，推动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国家治理、基层治理。“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习近平，2024: 482）

（三）建构中国志愿服务实践的学理化表达的迫切性

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已被纳入国家现代化战略，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2023年，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以下简称中社部）。中社部作为党中央的职能部门，履行在志愿服务领域统筹规划、制度建设、组织协调和示范引领的职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布局“推动志愿服务体系建设。”^①近年来，中社部主导或推动了一系列全国性、专业化志愿服务培训项目，推动了志愿服务事业健康发展。目前，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志愿者人数已超2.3亿，累计记录志愿服务时长超过52亿小时。构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既要总结志愿服务的实践经验，更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志愿服务领域的落地进行学理化表达，以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构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2023:478）可见，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是一项融理论创新、文化传承、实践总结、治理优化于一体的系统工程。

三、建构科学完备志愿服务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

面对上述现实挑战与理论需求，首先需要明确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为进一步搭建理论框架提供遵循。

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将中国志愿服务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中国志愿服务实践相融合。二是将中国志愿服务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系统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志愿服务思想，通过具体实践创造性转化，形成当代志愿精神的内核。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概念移植，而是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志愿服务实践中获得新的时代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阐明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习近平，2023:242）这深刻揭示了志愿服务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载体，其生命力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回应新时代社会文明的要求。通过传承文化基因、融入国家战略、解决现实问题，中国志愿服务将显著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中华社会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使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具备坚实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① 中共中央，202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1sRedirectHit=11454859）。

（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志愿服务实践相结合

纵观历史，“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中共中央宣传部，2024: 27）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直接使用“志愿服务”这一概念，但其思想体系中却蕴含了对服务活动的自愿性、无偿性的深刻思考，包括人的本质论和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的理论。一是相互信任。马克思写道：“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马克思，2009: 247）这深刻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在互惠与自我提升基础上，人们需要努力培养社会责任感，以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人际交往中的挑战与机遇，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建立起更加和谐、稳定且充满活力的人际关系网络。二是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认为物质交换并不等同于情感交往。志愿服务作为非强制、非谋利的服务形式，正是人的自由本质的体现。志愿者通过将个人的时间、技能、知识无偿奉献给社会 and 他人，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在消除劳动异化的环境中，劳动为每个人提供了全面发展和展示自己全部能力的机会，从而由负担转变为快乐。学者孙正聿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劳动”“人的解放”等思想进行了这样的阐释：“在人的追求自己的目的的历史活动中，以何种方式‘生产’和‘享受’构成人类文明的‘人造物’，这标志着人在何种程度上是‘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物’，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一步说，马克思深刻阐述了人类通过生产和享受在历史活动中实现自身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能够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人们在实践中不仅改造客观世界，也塑造自身，体现了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通过社会共同活动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既以物质生产活动满足生存发展需要，以精神生产活动获得精神满足。三是人的全面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阐述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2009: 571）“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2009: 571）这意味着，只有在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即个人通过联合实现自由发展的共同体中，人的自由才能充分实现。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2009: 30）四是志愿服务通过构建“奉献-互助”的社会纽带，强化个体与集体的有机联系，推动社会关系从“资本逻辑”转向“人的逻辑”。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描述了工人自发互助组织，这实际上是对志愿服务雏形的描述（恩格斯，2022）。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倡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强调通过人们的自愿劳动重塑集体主义社会关系。他指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阶级自觉自

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列宁，1986:15）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了志愿服务的实践性特点。列宁还指出：“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平凡的、但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者、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列宁，1986:11）这表明，共产主义实践中非悬于空中的理想，而是群众在解决民生、发展生产、社会互助等“平凡事情”中逐步实现自己目标的历史过程。社会动员者，包括志愿组织，唯有将理论扎根于生活土壤，才能将口号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号召学习雷锋精神。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这个题词是应《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求，于二月二十日为该刊一九六三第五、第六期合刊——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发表在三月二日出版的这两期合刊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200-201）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使个体服务于他人的行动升华为“乐生劳动”，获得了“为人民服务”的心理满足，契合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志愿服务诠释了“劳动创造幸福”，实现了物质贡献与精神满足的有机统一。六是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国际志愿服务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志愿服务思想嵌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探索“党建+志愿”机制，强化党组织动员作用，以“雷锋精神”激活时代文化，塑造新时代志愿精神。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志愿服务的思想，以人的社会本质和自由本质作为逻辑起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实践导向和终极目标，奠定了志愿服务的理论基础。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整合、文化转化（传统创新）、主体激活（共建共治共享），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在当代的飞跃。“共建共治共享”这一中国特色话语展示了强大的理论魅力，人们与他人建立共享现实的动机是人类社会本质的根本体现。“我们与他人建立共享现实的动机是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共享现实如何造就了人类。”（希金斯，2024:120）“共建共治共享”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信任、协调行动、自我确认，也在宏观层面推动了话语发展、文化建设和体制完善。因此，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志愿服务的思想和理论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围绕“人的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共建共治共享”等来建构志愿服务的理论基础，使其成为志愿服务理论的底层逻辑与核心内容，真正从理论上阐明志愿服务的自愿性、无偿性、互惠性内涵及其具体形式。

（二）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志愿服务实际相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志愿服务理念源远流长，这些思想不仅为现代志愿服务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涵养，更赋予志愿服务理论在当代发展的历史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习近平，2023:47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为涵养志愿者精神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有助于志愿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处世哲学和待人接物智慧，也有助于提高志愿者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使其更好与服务对象及团队合作。在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过程中，应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一宝贵财富。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伦理共鸣

一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傅佩荣，2012: 52）他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真心诚意的价值，从“亲亲之爱”扩展至“泛爱众”，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逻辑，奠定了志愿服务“利他性”的伦理基础。这些思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沈知方，2011: 110）如“《中庸》所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胡适：2016: 83-84）对此胡适解释道：“‘仁者人也’，只是说仁是理想的人道，做一个人，须要能尽人道。能尽人道，即是仁。”（胡适：2016: 83-84）儒家强调通过自我修养实现社会和谐，孟子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鼓励个人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服务社会、增进福祉。英国学者德博诺在《思考的革命》一书中指出：“几千年前，中国的孔子提出了儒家的待人之道。与西方宗教不同，孔子对人的精神世界不感兴趣，他更关注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互动。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以礼待人，文明就会发挥作用。”（德博诺，2023: 48-49）这段话展示了西方学者的视角，道出了中西文明的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志愿服务目标高度契合：“儒家所宣示的人生态度实是任何民族维持其生命的根本要素。这精神就是生生大道，是看到了人类和社会的真相，而用以成全其生命的道理。”（费孝通，2009: 269）

二是老子“德信”思想。在《道德经》中，老子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陈明，2016）老子不仅阐述了待人处事的智慧，也体现了对“道”的践行——以不争、包容、恒常之心，达至与万物和谐的境界。其思想核心是强调无为之道，以始终如一的“善”与“信”自然来回应世界。

三是墨家“兼爱”理念。墨子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提倡“视人若己”的平等互助，与志愿服务的“无歧视”原则相通。“表达尊重的程度也是影响他人行为的一种有力武器。一个自私的人也许只能得到周围人很少的尊重，另一个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则可能会得到人们很高的尊重。”（德博诺，2023: 50）墨家主张以实际行动助力民生保障。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伦理到实践的升华

一是“义利之辨”的奉献精神。儒家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要求君子要明大义、持道义，以道德和正义为准则行事；而小人则关注个人利益得失。“义利之辨”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自身道德修养，树立正确价值观，不被短期利益迷惑，成为有原则、有操守的人。如果社会每个个体都以义为先，尊重他人，遵守道德，社会将更加和谐。

二是把无私奉献视为道德最高境界。“为而无所求”，在现代语境下，当人们将“为”异化为获取社会声誉的工具时，便会出现“剧场效应”，如学生为升学购买志愿服务时长、“内卷化竞争”将志愿服务异化为绩效考核的追逐指标，本质上都是“有所求”的病态延伸。志愿精神要求人们真正理解“为”的本质，将志愿服务行动本身视为生命存在的诗意表达，体现其“无偿性”，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超越个人私利、追求社会福祉。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志愿精神内核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仁义并举”“仁”为动机，“义”为行动准则。在志愿服务中，“仁”

表现为志愿者对社会上需要帮助者的同理心。历史上，“义”被转化为邻里互助、救灾赈灾、支持教育等具体行动，形成了“动机—行为”的有机统一。民间历史上的“义仓”“义舍”互助实践表明，中华文明始终传承着利他奉献的文化基因，并时时刻刻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关于这一问题，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论及社会关系时说道：“所谓看穿也者，实在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若人们都只走到这一步：一方发觉一切痛苦快乐不会走出一己个体的器官之外，全世界只有自己才真的实在；一方看到了这贴肉的自己一忽儿就会灭亡，世界上就不会再有人类文明，更说不上社会组织了。”（费孝通，2009: 266）他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利是社会关系的基础，一旦人们走向绝对“利己”，社会将不复存在。新中国成立后，雷锋以自身的助人实践把传统美德升华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从青年志愿者、社区志愿者、环保志愿者，到2008年汶川地震中百万志愿者挺身而出，以及百万奥运志愿者的爱心奉献，再到2017年《志愿服务条例》颁布实施、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中国正在走出一条扎根传统、回应现实的独特志愿服务发展道路。

一是文化符号创新表达。中国志愿服务把“为人民服务”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仁爱”结合，塑造了新时代志愿精神。“最美志愿者”评选即是一例。

二是制度与理论协同创新。《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志愿文化宣传阐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崇高追求，把雷锋精神和志愿精神体现到志愿服务工作各方面，彰显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的时代价值和道德力量。”^①以制度化强化志愿精神和志愿服务，以“仁爱”为魂魄、以“互助”为经脉、以“济世”为目标，为现代志愿服务夯实了坚实的优秀传统文化基础，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只有使志愿服务回归“无功利之善”，才能使其成为涵养社会责任感的源头活水，从而不被异化为升学竞争的又一“筹码”。志愿服务的核心价值是由心而发的自觉奉献，不是可置换利益的货币和数字。当志愿服务项目设计回归“人的全面发展”，当志愿服务活动面向公平正义，当监管评估让每位志愿者真正感受到“爱”的温度，志愿精神才能成为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道德性’的内核成就了中华民族重道德教化的精神品质，‘社会性’内核凸显出中华民族重践履笃行、致用事功的责任情怀，近代社会转型催生的平民化、个性化人格，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叙事结构，为社会主义中国培育‘真善美’‘和谐统一’、‘知行’融会贯通的‘新人’理想人格准备了思想沃土。”（张瑞涛、宋霞，2025）

（三）志愿服务的本质规定性与社会功能

综上所述，可从自愿性、无偿性、进步性三个维度阐释志愿服务的根本特征：一是自愿性是前提与基础。其核心是“自主选择”，即个体基于个人意愿、兴趣或信念参与服务。自愿性体现了志愿者的主体性，即个体主动奉献时间、精力、知识与技能。二是无偿性是志愿服务核心标志。志愿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5，《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4/content_6946879.htm）。

者参与服务并非为了追求物质报酬或获取金钱、实物等利益，志愿服务的价值体现在对他人与社会福祉的贡献上。当然，无偿性不等于“无价值”或没有任何资金或物质支持。例如，很多情况下，志愿组织会根据项目设计与志愿者状况提供一定的资金或物质支持，如交通补贴、保险、服装等。三是进步性是志愿服务的价值导向。志愿服务行为必须符合社会发展方向，有利于社会进步，维护公序良俗，促进社会向善发展。

四、志愿服务理论的核心框架：“道术统一”

（一）志愿精神的价值内核：“道”的阐释

就志愿服务而言，“道”体现为价值理性和志愿精神。“更深层次地看，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思想理论之争、价值观念之争。”（中共中央宣传部，2024: 96）不同国家对于志愿服务的表述，看似在活动方式、语言符号、仪式制度层面展开，最终都归结到“人如何理解自己与世界”这一元问题。学科话语是表层，可听可视；学科内含的思想是逻辑、概念、推理、论证，可形成体系。学科内含的“道”则是一套关于“终极实在”与“人为何志愿”的根本假设。“道”具有不可通约性。志愿服务理论若仅停留在“说什么”的层面，或仅仅进行技术化表述，终是隔靴搔痒，难以触及实质。只有将研究深入到“人们为何志愿、服务他人”的层面，才能真正获得照见彼此“道”的契机。不同文化下志愿精神对话的目的，并非让一种“道”压倒另一种“道”，而是在互相交流中，使各自传统获得自我提升。理解不同国家人文社会科学背后的文化背景与价值取向，是对跨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本体论探索的核心挑战，这要求人文社会科学家具备批判性反思、跨文化敏感性和多层次分析能力。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都或多或少带有其产生的社会环境的文化特质。中国的“雷锋精神”研究与他国的“志愿精神”研究表面有相似议题，背后却隐含集体主义下的国家逻辑，或侧重自我的社会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家真正的价值解码不是学术窥探，而是以“跨文明学习者”身份参与知识重构。他们需具备文化转译者的素质，既能深入特定文明的语义内核，又能搭建连接不同价值观的桥梁。人文社会科学家的最终目标不是消除差异或“全盘接受”，而是在保持张力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态。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的建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技术革命以及商业模式的迅速迭代，仅仅“通过坚持旧的商业模式，组织得不到任何的学习和提升专业化水平，也不会仅仅因为这些想法是新的而便可以解决老的、复杂的问题。组织通过开放的态度和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来学习。我们需要勇气和创造力去解构过去的‘最佳实践’，并在未来恰当的时候做出改变。”（van Gendt, 2023）

（二）志愿服务的方法体系：“术”的定位

就志愿服务而言，“术”表现为工具理性与实践方法。“术”是形而下的具体方法、技巧与手段，指向实践层面的运作与应用，具有具体性、工具性和应用性。志愿服务的“术”阐述其具体活动，包括对象需求分析、项目设计、招募技巧、项目管理、评价激励等方法。进一步说，如果把“志

愿精神”视为志愿服务的“道”，即核心理念与内在动力，那么“术”则是指实现这一理念的具体方法、技能和手段。进一步分析，志愿服务的“术”主要包括：一是服务技能方面，涵盖专业技能、通用技能与服务流程方面。二是管理运营方面，包括志愿者管理、项目管理与资源管理。三是技术应用方面，如信息化平台建设与数据分析等。志愿服务的“术”涵覆盖从专业技能到通用技能，从服务流程到管理运营，从技术应用到心理调适等诸多方面，是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需要掌握和运用的具体方法和手段，是实现志愿精神的基本途径。

（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

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必须坚持“道术统一”。在中国优秀传统学术语境中，“道”与“术”是其核心范畴，其内涵与内在关系贯穿于哲学、政治、伦理、技艺等诸多领域，体现了传统文化对“根本规律”“内在机制”与“具体方法”“实际操作”的辩证思考。“道”是形而上原则，锚定事物本质、宇宙规律与价值核心，具有普遍性、根本性。“道”旨在回答“是否存在事关善恶的伦理问题。是否存在一种善的生活方式，一种恶的生活方式，抑或无论我们如何生活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存在一种善的生活方式，那么它是怎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又何以能学会过这种生活？”（罗素，2016:6）就生活品质而言，志愿服务是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道”与“术”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学术中“知”与“行”、“体”与“用”的完整系统。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发展志愿服务事业，“我们首先要解决方向的问题，因为没有方向就没有革命，而只有热情和牢骚。”（德博诺，2023:24）就志愿服务而言，“道”与“术”的有机统一要求重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结合，否则，志愿服务就有可能沦为非货币衡量劳动产出的商业劳务组织，例如服务时长买卖等。衡量志愿服务的影响力必须基于更广阔视野，更复杂的方法与更精湛的技术。运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术统一”理论分析志愿服务，可以清晰区分其精神内核与实践方法。

五、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的核心路径

（一）基于实践经验的归纳总结与理论提炼

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绝不应当在书斋里进行概念推演，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指引下，对五千年文明积淀开展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志愿服务实践进行归纳总结，既要从“雷锋精神”等中国实践中萃取智慧，也要在科学技术赋能中开拓新的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深沉持久的精神动力。当中国志愿精神在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中完成现代升华，它所书写的将不仅是中国社会文明的新篇章，更是人类文明互鉴的东方叙事。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必须以中国实践为根基、以全球视野为坐标、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形成多学科发力的系统工程。费孝通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命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时秉承的理念，对当前建构工作仍有启迪：“要在我国建立社会学，还必须从搜集材料工作做起不可。从社会调查入手也是符合实际的办法。”（费孝通，2009:209）

明确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一是坚定文化自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与中华传统美德结合，夯实中国志愿服务的价值基础，深刻把握志愿服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体的实践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习近平，2014）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没有坐标系的船，任何风都会使其偏离航向；没有志愿精神的“志愿服务”，随时都可能成为社会的撕裂点。志愿精神是志愿服务的“导航系统”，它回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开展志愿服务提供了判断对错、资源使用与组织动员的统一标准。志愿服务时长买卖显然是背离志愿精神的，不值得追求。二是从实践案例提升理论。系统总结雷锋精神、新时代文明实践、“党建+志愿”模式、大学生西部计划、奥运志愿服务活动成功经验，将中国元素融入志愿服务知识体系，形成可复制模式。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需经历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理论，从经验到命题的过程，深入分析鲜活案例与具体数据，从中提炼出更具普遍性的理论或命题。该方法在许多学科中已得到充分运用，眼下不妨在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中大胆尝试，其本质上是一个“抽象化”与“概念化”过程。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12: 14）恩格斯所说的“历史”既是指人类过往的重大事件，也包括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实。总之，志愿服务理论建构既要立足现实，又必须具备理论抽象。

若将志愿服务奉献分成时间、精力、知识与技能。时间被视为最核心的概念，因为奉献精力、知识、技能均需花费时间。时间的运用方法直接关系人们的喜悦与幸福感。“如果人们把自由支配的时间用于培养社会联系（如与朋友或家人一起出去玩）或有效地使用它（如爱好、锻炼），他们不会因为时间太多而感到不快乐。”（霍姆斯，2023: 10）如果人们自愿将时间奉献给志愿服务这种可以培养社会关系的活动，他（或她）会感到快乐与幸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目标感并不一定要从带薪工作中获得，志愿服务（无报酬的工作）通常也会给人目标感。”（霍姆斯，2023: 12）“做好事的感覺真的很棒。本周抽时间随机做两件善事，一件给朋友或认识的人，另一件给陌生人。做的事情可大可小，可以匿名也可以表明身份，可以提前规划也可以临时起意，花费时间或金钱均可，而且这两件善事并不一定要相同。”（霍姆斯，2023: 34）霍姆斯这句话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为而无所求”的智慧内核不谋而合，强调在志愿服务实践中超越功利性执着，以美好的心境展示当下的存在，让行动本身回归自然状态。其深层意义还在于，通过个人行为重塑现代社会的互动模式：弥补信任裂痕，激活善意潜能，抵御过度市场化带来的“意义缺失”。通过日常微小行动，既能探索自身善意的边界，又能为社会注入热情的解构力量。它鼓励每个人从细微之处着手，成为更温暖、

更互联、更和谐、更有意义的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也契合了“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所折射出的公平正义主张体现出一系列自身所独有的特质。”（潘玥斐，2025）志愿服务作为“自由时间”的崇高运用，有助于消除劳动异化，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内含着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自由个性的实现等未来预期的价值观念，这既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能够形成积极对话的维度，也是前者超越或者优于后者的关键之所在。”（潘玥斐，2025）可以借以下表述更深刻地理解“志愿服务时长”买卖的实质：“我有我的时间，你有你的时间，我们在市场上出售它。现在不仅雇主将你视为24小时的具体化劳动时间，当你照镜子时，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奥德尔，2024:43）这触及到了现代社会中时间商品化与自我异化的核心议题。市场机制有时会把时间商品化，使其不仅是个人生活的自然维度，也可成为买卖的“资源”。这句话呼应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尤其是“劳动异化”理论。当人们不以“我是谁”定义自己，而是完全以“用了多少时间”定义自己时，便可能失去对生活本质的掌控。“如果我想合理地行动，在确定某种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计划时，难道我不必考虑生产该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吗？如果不考虑时间，我至少会遇到一种危险，即我思想中的物品永远不会变为现实中的物品，因而它也只能获得想象中的物品的价值，也就是想象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2009:270）

（二）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学术化建构与深化

除了时间，也可以通过拆解“服务”进一步说明元理论建构。通常，“服务”指非实物的活动，旨在满足他人需求。更基础的问题是，服务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从其最基本元素结构看，服务包括需求、行动、资源、价值等要素。需求来自服务对象，涵盖生理、心理或社会需求。资源则包括人力资源、时间、技术等。服务同时发生在提供者和受益者之间，通常需要通过服务对象的体验、口碑、问题解决程度等验证其价值。服务依赖于特定资源流动，如人力、时间、技术、信息等。志愿者服务通过服务行为与互动满足他人需求，其底层逻辑涉及志愿者、志愿服务时长、技术水平（或含量）、服务能力、不可储存性（如为老年人提供陪谈需要在特定场景中即时完成）、不可分离性（教育志愿服务需要教育志愿者与学生互动）以及服务结果的难以直接量化（如心理慰藉效果因人因时而异）。当然，人们可通过评价服务对象需求满足程度间接测试志愿服务效果：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需求是否满足、满意程度如何等。通过服务要素拆解志愿服务，可以摆脱传统“活动评价”局限，回归“需求-响应-价值”链条，找到高效解决方案或创新方向。可将志愿精神、时间投入、服务要素作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的底层逻辑，由此延伸推演出其理论架构。该体系的本质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重构志愿服务本质、以中华文明基因重塑伦理基础、以中国治理智慧创新实践范式的理论体系，既要突破“个人主义志愿观”的局限，也要为全球志愿服务贡献“制度优势转化”“技术与人文平衡”等新话语。

（三）跨学科融合与数智赋能的创新路径

应发挥跨学科研究优势和数字技术应用在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中的系统性、变革性

作用。跨学科视角与数字技术不仅可以优化传统志愿服务知识结构，更能通过数据资源整合与智能分析框架，推动志愿服务从经验驱动向知识驱动转型。一是跨学科知识融合。志愿服务研究跨学科特性基于志愿活动本身所涉及的复杂社会关系、多元行动主体以及多维度实践追求。它要求整合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社会治理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以揭示志愿服务的社会功能与发展路径。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必须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多学科力量，构建新理论范式，解决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需消除不同学科在术语与研究范式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合作障碍，协调多方关系，建立学科研究的综合评价体系，从而全面揭示志愿服务的内在规律。二是赋能知识创新。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解析成千上万的案例报告，系统建构“问题导向-项目设计-组织动员-管理协同-激励机制-成效评估”等理论模型，加速志愿服务知识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可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库，包括“仁爱”“兼济天下”等概念，将其与志愿服务实地案例、具体项目结合，生成志愿服务理论体系。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新机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志愿服务资源配置的精准性，推动“术”的创新。研究者基于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分析被服务对象的个性化需求，生成个性化服务方案，并对个体行为进行深度分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进入家庭和社会，志愿者对话机器人可收集受助者反馈，动态调整志愿服务的内容和形式，研究人机互动环境下的志愿服务方式方法，拓展志愿服务理论和方法。人工智能技术有望助力志愿服务理论“动态调整”“实践反哺理论”，推动理论体系科学化、系统化、整体化。研究者可构建虚拟仿真平台，模拟不同的服务场景、理论场景、政策场景对志愿服务生态的影响，检验理论假设。当然，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性，它不仅是工具，未来或将成为建构志愿服务理论体系的核心动力之一。通过人工智能驱动的理论构建、决策支持、动态评估、跨平台协作与伦理保障等，志愿服务理论体系将从案例经验提升、理论推演走向科学建模，最终实现“道术统一”的整体，赋予志愿服务理论更强的指导性、可阐释性。

六、结论与展望

建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本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和生动实践。在国内，志愿精神应强调“中国特色+国际接轨”；在国际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大模型开源体验等载体传递中国志愿精神。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文化主权，以国际化加强文明对话，使中国志愿精神既扎根“家国情怀”，也贡献“天下大同”，形成既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又回应人类共同需求的志愿服务理论体系。未来需要在三个维度持续深化：在理论层面，完善“志愿服务”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在实践层面，发展和完善志愿服务法律制度保障；在全球层面，推动形成更具普世性、包容性的国际志愿服务准则、理论与方法。当东方的“仁爱”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深度交融，中国志愿服务必将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新的精神特质和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理论。当前，面对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科学理论的深度发展、技术的革命性创新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中国志愿服务事业

和志愿服务理论“必须以全新的视角展望未来，因为过去的发展并不能保证未来。”（van Gendt, 2023）简言之，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构“道术统一”的中国志愿服务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 爱德华·德博诺，2023，《思考的革命》，柏惠鸿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伯特兰·罗素，2016，《序》，《西方的智慧——从苏格拉底到维特根斯坦（全译本）》，瞿铁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明主编，2016，《老子庄子（选）》，北京：新星出版社。
- 费孝通，2009，《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费孝通，2009，《费孝通全集》第八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傅佩荣，2012，《论语之美》，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 恩格斯，2022，《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文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胡适，2016，《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 凯茜·霍姆斯，2023，《时间贫困》，柳管、万茜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列宁，1986，《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潘玥斐，2025，《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视域下的公平正义问题》，《人文杂志》第5期。
- 沈知方主编，2011，《四书新解》，蒋伯潜注释，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 孙正聿，2025，《人何以为“类”：“人是类存在物”的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哲学研究》第6期。
- 托里·希金斯，2024，《共享现实：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张彦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习近平，2014，《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 习近平，202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习近平，2023，《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第20期。
- 习近平，20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 张瑞涛、宋霞，2025，《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叙事结构与镜像形塑》，《文史哲》第3期。
- 珍妮·奥德尔，2024，《时间：流逝与永恒，走向更深刻的生命体验》，董方源、邓岳译，北京：中译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宣传部，2024，《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 Rien van Gendt, 2023, “Philanthropy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Shaping a Future Agenda”, <https://philea.issue-lab.org/resources/42535/42535.pdf>.

content and users' actual needs. Second, focus on hierarchical system design to improve the alignment between platform system functions and users' digital literacy. Third, focus on optimizing multi-task co-processing scenarios to perfect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platform service ecosystem and users' assistance contexts.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Volunteer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allenges, Principles, Framework, and Approaches

..... *Ding Yuanzhu* 134

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new situations and issues in the field of volunteering, along with three major challenges: the lag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inadequate research paradigms, the need to strengthen legal frameworks, and the impact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n value rationality. It proposes pathways for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volunteer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uided by the adapta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rooted in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ystem draws on practical experiences from field cases such as the “Party Building + Volunteering” model. The aim is to elevate volunteering from practical innovation to a system that embodies civiliz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oretical confidence, and technical practicality—an integration of Dao and techniques. Currently,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the proliferation of social media, and the digital wave have become fundament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volunteer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volunteering must respond to these factors and contribute to addressing broader social issues. The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its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integration of Dao and techniques” in voluntee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into contemporary value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ole model of volunteering in suppor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Learning without Doing" and "Practitioners Awaiting Specialization":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Turnover Intention Among Social Workers

..... *Wu Fan, Wen Tenglong, Yan Hao* 148

Abstract: Currently, the social worker population in China exhibits three major characteristics: "learning without doing", "practitioners awaiting specialization", and "high turnover rate". Focusing on this group's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areer stabi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s talent pool. Based on human capital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 this paper utilizes a national sample of 4,558 cases from the China Social Work Dynamic Survey to deeply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workers'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their turnover intention, te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social workers with a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overall turnover intention is high; compared to